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近代天津十大冤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津十大买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ISBN 7-201-03910-5

I. 近… II. 中… III. 企业家—生平事迹—
天津市—近代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77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022-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字数:174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8.50 元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黄炎智

编 委 田桂林 杨大丰 李树人

方兆麟

主 编 方兆麟

副主编 林 敏

总 序

黄炎智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转瞬间 20 世纪行将结束，新纪元即将到来。在世纪之交，回首天津百年之历史，真可谓沧桑历尽，覆地翻天。自明朝设置天津卫以来，至 20 世纪末，天津尚不足 600 年历史；但自上世纪末至今的百余年间，天津却饱经风霜，从外辱内患、到阅尽人间春色，特别是 19 世纪末叶至 20 世纪中期，天津作为京畿门户、海防重地、北方经济中心，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很多著名历史人物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曾几何时，各路豪杰在此舞旗弄潮，各方志士在此砥砺前行。于是，军事救国者有，实业救国者有，教育救国者有，科学救国者有……芸芸众生，不一而足。然而大潮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仁人志士风云际会于津门外，也有来此淘金的、冒险的、寓居的、醉生梦死的。正是这种珍珠与鱼目的共存，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近代天津，天津也因此而名传天下。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天津的发展更是如此。纵观百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活跃在天津这个舞台上，从不同侧面或者推动、或者阻碍天津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把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将其真

实地再现，人们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而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过去，了解天津。有鉴于此，1996年下半年，首先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汤洪、方兆麟等同志提出来编辑一套“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设想，我对他们的设想十分赞赏，随即提交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讨论，经过谢天培、南炳文、孙维甫、乔维熊、杨大辛、田桂林诸同志的充分研究，认为这件事不仅可行，而且十分有意义，对于宣传天津、进一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很有必要。同时一致推举我任该丛书的总主编。我当时作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于是这个设想被正式定下来，列入工作计划。为了使这个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由我主持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具体研究编辑方案。参加第一次座谈的同志有张澜生、徐景星、罗澍伟、乔维熊、杨大辛等同志，大家兴趣很高，七嘴八舌一下子提出了近20个选题。经过议论，进一步明确了编书的宗旨、编辑体例，确定了首批编辑书目。同时也确定了担任这套丛书各分册主编的原则。大家认为各分册主编应尽量由熟悉选题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

然而编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不仅要组织人力，还要下很大力量去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出版这套丛书要有经费，有了“经济基础”这项工作才能有保证。为此，我让文史办公室尽快起草个申请专项经费的报告，并将报告立即转报给市政协主席刘晋峰，晋峰主席很快将此件转市政府张立昌市长。立昌市长非常重视此事，很快批下了经费，从而使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了保证。经过各方面近两年的努力，现在终于看到这套书要陆续出版了，怎能不令人欣喜！可以说，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首批确定的6个选题,即近代天津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寓公、买办和京剧票友。在编写过程中既考虑到了其史料价值,同时又注意到了内容的可读性。每本书收录10人左右,都是经过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研究后筛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各书的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物做了翔实、生动的记述,从而使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周学熙是如何兴办北洋实业的?范旭东是如何创制出“红三角”牌纯碱的?宋棐卿是怎样纺出“抵羊”牌毛线,并使之行销全国的?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是怎样兴办南开教育的?民国初年林墨青是如何兴办社会教育的?收藏家张叔诚是如何得到无价之宝“窑变观音”,最后又怎样被毁掉的?夏山楼主韩慎先除了是“名票”外,他在鉴定与收藏文物方面有哪些“绝活”?北洋时期的总统、总理及一些大军阀下台后来天津干了些什么?清末宫廷大太监“小德张”出宫后在天津怎样度过了他的晚年?天津京剧名票“三王”对京剧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是哪些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等等、等等。我相信通过书上那生动、翔实的描写,不仅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个丰满、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且还可以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和趣事,而这些恰恰是在一般历史书籍中难以看到的。这些历史人物虽然生活在天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局限于天津,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侧面,因此这套书对干学习中国近代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天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地充实这套系列丛书的内容,陆续向读者推出新的书目,如天津著名的商人、著名的银行家、著名的报人、著名的曲艺家、影剧名流、社会名流等等。总之,我

们将通过这套书使读者更加了解天津、认识天津,也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点有用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同志参加到编著这套丛书的工作中来,为发展天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套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是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各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收集资料,由于他们的努力为成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再者,是各书的主编们,他们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各自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他们在工作的百忙之余,积极策划,审定稿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粗取精,去虚存实,才使这些书能顺利付梓。还有这些书的责编与出版者,也都花费了不少精力,一遍遍的审校,使这些书能最后出版发行。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诚然,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特别是在历史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和谅解。

谨将此丛书作为世纪之交的献礼,愿人们接受它!

1998年11月

序

方兆麟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阶层，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而产生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9世纪上中叶，窥视中国已久的西方列强在其“炮舰政策”的指挥下，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接着便开始了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下，帝国主义的鸦片充斥了中国的市场，而中国丰富的宝藏和资源却源源流入了西方列强的腰包。一次次侵华战争，迫使腐朽的清政府割地又赔款；一次次变本加厉的掠夺，使一些本不强大的国家成为新兴帝国。正像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向日本赔了相当于当时日本五年财政收入的巨款后，日本外相井上馨说的那样：“无论是政府或是个人顿觉无比的富裕。”中国的买办即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最早的买办，大多是从为洋人做勤杂开始的，他们有的是仆役，有的是厨师，有的是园丁，也有先是作苦力或小职员而后受到洋人重用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文化的侨商子弟。他们会一些洋文，了解洋人的处事方式，因而受到洋人的赏识。一些洋

人为了便于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便把身边这些信得过的中国人委任为“大班”、“大写”，为其办理生意上的事务，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买办阶层，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力量。这一代买办发家后，意识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所以不惜一切将自己的子弟送往国外深造，使其成为有文化、懂国际贸易的人，这就出现了第二代、第三代新买办。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二、三代买办主要是托庇于老一代买办的荫福，真正有大作为的不多，有些不成器的甚至成了败家子，因为他们的时代已毕竟不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而且随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逐渐衰落和消亡，他们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本质上说，买办作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为帝国主义殖民政服务而发家的资产阶级，应该是受到批判的。然而用今天观点看，买办应该是一个经济阶层，而不是政治范畴中的概念。作为买办个体而言，在他们的发家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具体的差异，通过记述这些买办不同的发家史实，可以更有助于今天的读者从这些有血有肉的史料中了解买办产生、发展的过程，对买办这一已成为历史的阶层有更清楚地认识。而且他们的经营之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看来，也许不无可借鉴之处。这就是编辑本书的初衷。

当然，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开埠较早的城市之一，而且是当时北方的商业中心、国际贸易中心，自然形成华洋杂处之地，因此也成为买办相对集中的城市。而买办在天津的活动，对天津城市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天津历史，特别是天津经济发展史，不能不涉及到买办，这也是编辑本书的主要目的。天津的买办最早是来自广东和江浙一带，这个不言而喻的原因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那时天津号称有“四大买办”，即本书中介绍的梁炎卿、吴调卿、郑翼之和王铭槐。继而又有叶星海、严蕉铭、宁采轩、冯商盘等人；还有从天津起家的李辅臣、高星桥、杜克臣等等。他们当中很多人可以说是“发于畎亩”、“举于版筑”、“举于渔盐”，而后凭借自己的勤奋、能干或钻营，一步步向上爬，最终成为买办的。像本书中的高星桥，原本是一个铁匠，最后不但成为大买办，而且还成为德皇亲封的德国贵族，这在中国的买办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再有像高少洲，从一个小职员起家，而后买了洋行的招牌从事经营活动，最后成为天津有名的买办之一。也有些买办后来成为爱国实业家，如天津的毕鸣岐。可以说，买办发家的过程，也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在这方面尽管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发家过程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一个侧面，因而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天津虽然有不少有名的买办，但由于缺乏丰富、翔实的史料，因此有些买办的传记无法收入到本书中来，只好作为附录编于书后，供读者参考。而且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买办的图片资料已很难收集到，无法展示给读者，成为本书的一大遗憾。这只有待日后进一步收集、补充和修订了。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众多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鼎力支持，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也欢迎广大读者对书中疏漏之处不吝指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

目 录

总序	黄炎智(1)
序	方兆麟(5)
太古“大班”郑翼之	邵 华(1)
广帮首富梁炎卿	刘海岩(18)
三起三落王铭槐	林 放(39)
官商合一吴调卿	曲振明(53)
一生风云策剑秋	郝庆元(79)
传奇买办高星桥	尚克强(96)
“负疚实深”魏氏父子	津 文(127)

天津“仁记”李辅臣

秦 颖(160)

名洋实中高少洲

穆 明(180)

爱国敬业毕鸣岐

张绍祖(196)

附录

林 放(219)

太古“大班”郑翼之

邵 华

在广东帮买办中，太古洋行的买办郑翼之可谓一生平安，平步青云。他出生之日，正是民间习俗供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因此传说他一生得到“灶王”的辅佑。

郑翼之的父亲郑文瑞是广东香山县南 80 公里处雍陌墟村的一个富农，共有九男八女。郑翼之排行老五，由于他诞生在腊月二十三，亲朋好友都来道喜，说这个孩子将来准会做大官发大财。其父大为高兴，取名为官辅，直到他上私塾后，才改名为文麟，别名翼之。

一、太古洋行和郑翼之

郑翼之自幼勤学好问，16 岁时随其长兄到上海，进入英商太古洋行。

太古洋行，英文名称是 BU—TTERFIELD & SWIRE Co, LTD. 它创立于 1812 年，设于英国兰开夏郡的利物浦港。创办人是约翰·亨利·斯可特(JOHN HENRY SCOTT)，生于英国的苏格兰。斯可特原是一个绸缎商人，曾走私过鸦片，但没有经

营过船舶事业，他看到当时远洋航运贸易日益兴隆，就想要从事远洋贸易。但从事远洋贸易就必须有船只，而要有船，就必须开办造船厂。他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希望的行业，于是，便和一个名叫司韦尔(J. S. Swire)的商人，在苏格兰的克米德合资设立了造船厂，这就是最早的太古洋行。

随着造船业的发展，由造船进而发展为经营航运。依靠克米德造船厂所生产的船舶，开辟了伦敦至远东的贸易，后将行址移到了伦敦。太古洋行在伦敦的名字是约翰·斯维尔公司(John Swire & Co)。J·S 斯维尔是被约翰·斯维尔公司派到远东来的负责人。他于1866年到上海后，便设立了约翰·斯维尔公司的分公司，这就是上海英商太古洋行。1867年该行与英商巴特费尔合作组成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该行的买办由广东籍莫某把持。1877年郑翼之进入该行后，经莫某的推荐，到账房作练习生。郑翼之的汉文底子深，但对英文却是一窍不通。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看他工作勤恳，又好学，认为是个人才，在工作之余，加意培养他学习英语。郑翼之本来就聪明好学，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刻苦自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语口语对答如流，尤其在英文文字的运用上造诣颇高，为同事们所不及，深得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的赏识。

1881年上海太古洋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英国总经理斯维尔指派郑翼之随同洋员北上，进行筹备工作。太古洋行天津分行办事处初设在英租界河坝道(今台儿庄路)聚立洋行旧址，有平房9间，航运方面也只有几艘破旧船只。最初，由于天津太古洋行用了生活放荡、不理业务的买办黄国祥，生意全靠郑翼之奔走操劳。在上海总行的支持下，郑翼之大显身手，发展津沪、津港

等航运。开始行驶于津沪线的仅有“奉天”、“顺天”、“通州”3条船,行驶在津港线的仅有“夔州”、“惠州”两条船,沿途在烟台、威海卫、汕头、广州等地装卸货物。数年之后,便增加到了“武昌”、“盛京”等20多条船。与此同时,香港太古糖坊出产的洋糖也大量运到天津销售。轮运与食糖成为天津太古洋行的两大业务,而所有对华人的联系与业务的开展,全落在一个吃工资的职员郑翼之的身上。后来,黄国祥去职,又用了—个姓杨的买办。杨是经汇丰银行买办、安徽人吴调卿推荐的。杨到行不久,正值有一大批砂糖运卸到海河太古码头,杨某害怕大垛糖包被雨淋湿,自己无法赔偿,急忙辞去买办一职。吴调卿见到郑翼之年轻有为,就又举荐他继任买办。那年是1886年,郑翼之才26岁,就当上了太古洋行的买办。

不过,当买办也有风险,要交纳保证金(寄库金,也叫“押柜”),作为中国买主或卖主可能发生毁约或亏欠情形时的抵偿。而且保证金的数额是随着太古营业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到1916年郑翼之在天津太古洋行的保证金增加到30万两,其押品有:

天津福安里房地产一处估价37800两

天津合和盛栈房地—处估价5000两

天津俄租界牛骨厂地皮—处估价1800两

上海余荫里房地—处估价202500两

扬子保险公司股票—百股估价12433两

以上五项共估价269533两,作价9万两。此外,天津新华路住宅也为押品,但未估价,实际共估价30万两。这种巨额的保证金,不仅换取了太古洋行对郑翼之的绝对信任,还给天津太古洋行提供了一部分流动资金。由此可见,郑翼之与太古洋行是相互

为用的，郑翼之以太古洋行为靠山，把产业放在太古代替现金寄库，对他的产业的收益并无影响，但却换取了洋行的高度信任，身价扶摇直上，成为“高等华人”。洋行流动资金的增加，业务的扩展，也使郑翼之增加了应得的佣金。双方各自都得到了好处。

二、郑翼之的经营之道

郑翼之当买办时，太古洋行已经积累了大量资财，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17号建立了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营业方面随着上海总行的扩展，逐步发展。当时天津太古洋行的外方代理经理有地音（DEAN. V. T AIGNO PERPO）、维克费尔德（WAKEFIED）、比林哈司特（BIEINGHASAT）、伯雷克（BLAKE R H）、马歇尔（MANCHI L T S），货栈主任斯特林（STINLINGL），塘沽主任可鲁姆白（CIOMING）、大沽坝领航员比尔（BEER CAFT TG）等（译自《华北行名簿》）。

轮运是天津太古洋行的主要业务。天津太古洋行代理中国航海公司、海洋轮船公司、中国联合航行公司、加拿大政府商船公司、天津驳船公司、香港太古船坞工程公司等业务。它和怡和洋行相比，在航线轮运的管理上比较严密，航线（包括东三省在内）比较长。郑翼之对天津口岸的经营可谓煞费苦心，他为了方便运输，在大沽口外自设一处船坞。天津海河狭窄弯曲，船身较长的轮船进到海河便不能转头。郑翼之为了独揽进出海河的生意，特在英国订制了“湖北号”、“湖南号”两轮，以适应海河的特殊情况。

食糖是太古洋行的另一主要业务，它的销量在我国居于各